

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
中華書局編輯部 編

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稿本

中華書局

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
中華書局編輯部

編

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稿本



第一冊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稿本:全16冊/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,中華書局編輯部編.—北京:中華書局,2015.11
ISBN 978-7-101-11184-2

I.梁… II.①清…②中… III.梁啟超(1873~1929)—年譜 IV.B259.1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5)第 194968 號

責任編輯:張玉亮

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稿本

(全十六冊)

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
中華書局編輯部編

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

*

880×1230 毫米 1/16·505¼印張·32 插頁

2015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:1-150 冊 定價:9800.00 元

ISBN 978-7-101-11184-2



又讓任公復生一回

——序《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稿本》

劉東

一

自受命來清華園復建這所曾經輝煌的國學院，就算跟梁啟超的種種年譜結下了緣，先買來並細讀了上海人民版的《年譜長編》，又合作推動了中華書局版的《年譜長編》，而到了大前年也就是二〇一二年，則邀來京都大學狹間直樹教授來此主講「梁啟超紀念講座」，——當然還是衝着他是日本方面研究梁啟超的權威，曾在岩波書店編譯出版過煌煌五卷本的《梁啟超年譜長編》。再定下神來回味，或許正是這種接續着編寫年譜的傳統，才算得上最爲「中國化」的修史傳統吧？所以，也正是跟這一點相連，自己以往才曾不斷地起疑：儘管後世已把四部中的「乙部」視同于西學中的「history」，可若是嚴格計較起來，在前者所指的「歷史」和後者所指的「歷史學」之間，仍存在着十分微妙的、也相當值得重視的區別。大約正因爲這樣，也就只有同我們共用着東亞傳統的日本或韓國學者，才會在年譜編寫方面具有共同的語言。比如，來新夏還列舉過他們在這方面的著作：

甚至還有外國學者爲中國學者文人補撰年譜的，如日人鈴木虎雄編有《沈約年譜》、《李卓吾年譜》和《吳梅村年譜》，神田喜一郎編有《顧千里年譜》和《江晉三先生年譜》，小澤文四郎編有《劉孟瞻先生年譜》等。又如朝鮮人元泳義所編《孔子實紀》四卷，也是孔子年譜的一種。^{〔一〕}

〔一〕 來新夏、徐建華：《中國的年譜與家譜》，第二〇頁，北京：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，二〇一〇年。

更讓人興味濃厚的是，作為這類很特別的歷史作品的著名傳主之一，我們在此想要事無巨細地予以綜述的梁啟超，其本人還特地反思過年譜的應有寫法。讀者可以就此參看任公的《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》，他在其中先是把「專史」分為五種，即所謂「人的專史」、「事的專史」、「文物的專史」、「地方的專史」和「斷代的專史」，又在有關「人的專史」的分論中，專門把「年譜及其作法」拎出，跟「合傳及其作法」、「專傳及其作法」和「人表及其作法」等，並列為對於個人歷史的幾種敘述方法。——由此一來，我們也便可以根據梁啟超的論述，來檢驗一下後人為他編寫的年譜，是否達到了他本人所預設的要求。

這樣一種相互纏繞的互文關係，又讓我想起了多年前接觸過的、反映在法國作家紀德筆下的「紋心結構」，正如萬德化就此分析的：「人物之間的雙重關係豐富了小說的內容，但也使得用單一方式對它進行解讀變得非常困難。這個技巧創造了一本『小說中的小說』，因為紀德的小說，也就是另外一個人物（即愛德華）準備創作的小說。」^{〔一〕}而有意思的是，就像筆者自己又曾說穿了的，中國讀者對於這種紋心結構的，哪怕是並不很自覺的瞭解，則來自紀德在中國的追隨者——卞之琳的那首名詩：

你在橋上看風景

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

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

你裝飾了別人的夢^{〔二〕}

那麼，如果照梁啟超本人看來，「年譜」這種土生土長的歷史文體，到底有怎樣的緣起或寫作動機呢？——只要翻開任公的著作，就能為此找到相應的回答：「年譜這種著述，比較的起得很遲；最古的年譜，當推宋元豐七年呂大防做的《韓文年譜》、《杜詩年譜》。做年譜的動機，是讀者覺得那些「文詩感觸時事的地方太多，作者和社會的背景關係很切；不知時事，不明背景，冒昧去

〔一〕 萬德化：《安德列·紀德〈偽幣製造者〉一書中的紋心結構》，第九六頁，北京：中央編譯出版社，二〇〇七年。
〔二〕 卞之琳：《斷章》。

讀詩文，是領會不到作者的精神的：爲自己用功起見，所以做年譜來彌補這種遺憾。」^{〔一〕}如果再驗之以孫詒讓的說法，便可知任公的說法大致不錯：「自北人以陶、杜之詩，韓、柳之文，按年爲譜，後賢踵作，綴輯事蹟以爲書者日多。於是編年之例通於紀傳，年經月緯，始末昭燁，此唐以前家史所未有也。蓋名賢魁士一生從事於學問論撰之間，其道德文章既與年俱進，而生平遭際之隆汙夷險，又各隨所遇而不同，非有譜以精考其年，無由得其詳實。」^{〔二〕}

不過，基於自己喜歡刨根究底的求知欲，上述說法都還不能算是特別解渴。正因為這樣，儘管在一篇序文的有限篇幅內，還不能太過率性地予以展開，我在此還是想要簡單列舉一下，就此還可能給出怎樣複雜的答案。——在我看來，「年譜」這種歷史文體在中國的定型與風行，其成因至少不應少於下述幾項：第一，現世主義的取向；第二，個人主體的尊重；第三，歷史意識的發達；第四，就事論事的態度；第五，印刷文化的興盛；等等。

進一步來申說，在上述複雜的成因中間，還存在着邏輯遞進的潛在關係。首先，只有在一種現世主義的文明氛圍中，才會自然地導向注重當世，而不是來世的文化心理，從而也才會創造出、並守護着這個特定的人文世界。其次，既然這個豐富多彩的人文世界，原本就是由人類主體所創化的，而不是由任何外在的神明，那麼，這一個個具體人類就理應受到尊重，而且這種態度也就體現爲對於接續創化活動的激勵。復次，正因為既要去守護這樣的人文世界，也要去尊重創化出它的具體個人，就相應產生了記述個人事蹟的歷史著作，而不是記述超驗神跡的宗教著作。再次，正因為有了如此發達的歷史意識，人們對於已然發生的事實，就傾向於抱持樸實的尊重態度，從而不光自己懷有秉筆直書的衝動，也會以同樣的態度去對待前人直書的結果。最後，上述這組文化因數的潛能，一旦被種植到了兩宋的土壤中，就會因當時物質文明的發達、特別是印刷技術的發達，而得到空前的激發和光大……

這就是我對於「年譜之起源」這類史家問題，或許更富於思想家旨趣的回答。也正是本着與此相應的認識，我在前不久的文章中才會指出：「出於同樣的心理原因，基本的史實，作爲一種共通的經驗，作爲一種認同的基礎，一種誦念的常項，一種標準的

〔一〕 梁啟超：《中國歷史研究法·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》，第二五八頁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二〇一四年。

〔二〕 孫詒讓：《昌黎先生年譜·序》。

記憶，也並不需要過於別出心裁的、作為個人專利的刻意『創新』。所以，如果有人執意去做『翻案文章』，這種小知問問地要『小聰明』，絕對會被具有古風的史家們所厭棄。」〔二〕讀者們明鑒，我在此還是要試着指出，在中國本有的「歷史」和隨西風傳來的「歷史學」之間，仍然存在着某種微妙的、不可不察的區別，——它更強調當即記下剛剛發生的事件，而不是到了時過境遷之後，再把它們當作棋盤上的棋子，來推繹作為某種研究成果的虛擬因果關聯，甚至將對於這些過往事件的出人意表的說明，當作抒發自己對於人生看法的特殊形式。

也許並非巧合，我們眼下也可以從梁啟超那裏，看出他對於年譜寫作的類似要求來：「本來做歷史的正則，無論那一門，都應據事直書，不必多下批評；一定要下批評，已是第二流的颜色。譬如做傳，但描寫這個人的真相，不下一句斷語，而能令讀者自然瞭解這個人地位或價值，那才算是史才。做傳如此，做年譜也如此。真是著述名家，都應守此正則。」〔三〕讀者們或會聯想到，這正是從《春秋》那裏承繼的家法，而任公又據此批評道，像蔡上翔的《王荊公年譜考略》，和胡適的《章實齋先生年譜》，都未能嚴守住這樣的家法，而過多地表達了作者的見解；——豈不知，「固然各人有各人的見解，但我總覺得不對，而且不是做年譜的正軌。」〔四〕

當然，這裏又要小心地拿捏。一方面，作者的確不宜在年譜中多發議論，而要讓事實本身來說話。由此可見，儘管中式的「歷史」和西式的「歷史學」，看似都在平鋪直敘以往的事情，骨子裏却還是不盡相同的，因為後者往往更強調主體的立場，否則就不能匠心獨運地「釋義」了，而作者本人的「史家」地位亦無從確立。在這個意義上，也許以往大家都忽略了，當克羅齊說出「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」的時候，他所意指的不過是西方的「歷史學」，而非中國古人所講的「歷史」，後者早已落成為確鑿的事實，只能被照原貌給直書下來。——可以再換個說法，如果後者因其初始和本源而被稱作「歷史一」的話，那麼前者則因其次生和衍變而應被稱作「歷史二」。

〔一〕 劉東：《對於往事的中國記述》，《中國青年報》，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五日第十二版。

〔二〕 梁啟超：《中國歷史研究法·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》，第二七三頁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二〇一四年，着重號為引者所加。

〔三〕 梁啟超：《中國歷史研究法·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》，第二七四頁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二〇一四年。

可另一方面，既要睜大眼睛去盯住每個細節，以誠敬之心去為某位傳主修部年譜，這件事本身却又不言自明地，說明了作者的潛在崇敬態度。正如梁啟超本人又就此論說的：「我們心裏總有一二古人，值得崇拜或模範的。無論是學者，文人，或政治家，他總有他的成功的原因，經過，和結果。我們想從他的遺文或記他的史籍，在凌亂浩瀚中得親切的瞭解，系統的認識，是不容易的。倘使下一番工夫替他做年譜，那麼，對於他一生的環境、背景、事蹟、著作、性情等可以整個的看出，毫無遺憾。從這上，又可以得深微的感動，不知不覺的發揚志氣，向上努力。」^{〔一〕}由此，儘管我們也都瞭解斯皮瓦克式的反彈，知道即使是「賤民」或芸芸衆生，也都有權在歷史文本中發聲，不過若是依着傳統中國的心情，針對一位具體的歷史人物，究竟是值得寫篇「本紀」還是「列傳」，還是乾脆就對之棄而不談，又或者究竟是否值得為他編部「年譜」，乃至編部事無巨細的「年譜長編」，那還要取決於傳主的位置與高度。

無論如何，就正面的文化意義來說，在如此浩如煙海的史部中，打開那林林總總的年譜，看到一個個具體而微的、活靈活現的、千人千面的人物，我們總是不可能不想到，這正說明了對於過往人物及其功業的尊重。所以，如果再從任公提到的兩宋時代向上回溯，那就要再追蹤到宣導「三不朽」的古老傳統，從而跟着錢穆去沿着司馬遷向上溯源了——「錢穆討論紀傳體問題如同他討論《史記》書名時一樣，並沒有把目光僅僅局限在史學著作上，而是聯繫到先秦諸子。這是極具啟發性的。由諸子而發現歷史中特別看重人的事實，這就把思考引到了正確的軌道上來。因為以『人』為中心的紀傳體史學著作之所以出現，一定是因為對『人』在歷史上的作用有了新的認識。」^{〔二〕}

耐人尋味的是，如果比照着西方文化的鏡像，這當然也可被說成某種中式的「傳紀」。不過仍需留意的是，那些大規模的人物傳記，在西方的印刷歷史上，反而屬於相對晚出的現代讀物，它們更要迎合圖書市場的需求，所以更屬於大眾化的商業行為。在這個意義上，倒是這種歷時久遠、其來有自的中國式年譜，反而並非為了取悅別人，倒首先是為了滿足年譜的作者自己。——正如

〔一〕 梁啟超：《中國歷史研究法·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》，第二八一頁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二〇一四年。

〔二〕 胡寶國：《漢唐間史學的發展》，第一三頁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二〇一四年。

梁啟超就此給出的判斷：「時人做的年譜真多極了。他們著書的原因，大概因景仰先哲，想徹底瞭解其人的身世學問，所以在千百年後做這種工作。」〔二〕此外，從問題的另一面來說，同樣是出於這種研究的心情，凡是看慣了年譜的方家，則情願閱讀這種處處「留白」的古老文體，而不是被想象力灌滿了的、更具有文學格調的現代傳紀。

不過，既已說到了這裏，也就應當不失平衡地指出，一旦被移植進當代的學術環境，什麼種子都有可能「橘化為枳」。如果說，在政治壓力過大的歲月，這種對於史料的巨細靡遺的編纂，還能幫我們留存一點歷史真相，從而期許着「守先待後」的學術之功，那麼，年譜這種歷史文體的存在，在當今這個「佞史」壓過了「良史」的年代，也有可能讓史林裏充滿了南郭先生。「人們似乎不約而同地發現了，寫史竟能提供一種非常方便的藉口，來掩飾自己內心的惰怠無能，因為它相對而言更容忍述而不作的表面形式，並不苛求獨立大膽的立論。」〔三〕——正因為這樣，就有必要仍以那句「古之學者為己，今之學者為人」〔四〕的古訓，來在學人中呼籲恢復古風的回歸。在我看來，想要判明究竟是「橘」還是「枳」，其標準也還是相當簡捷明瞭的，只需看作者編寫年譜的初始動機，到底是在「為己」還是「為人」——因為，只要作者的動機是屬於前者，他就不會停留在年譜的編寫上，而只會將此當作學術的初階；而更重要的是，只要其動機是屬於前者，他就理應在對於前賢的追慕中，逐漸得到自身境界的提升，而這些都終將在他今後的治學中，自然而然地、堅定不移地表現出來。

二

後人將來恐怕都難以置信，對於梁啟超年譜長編的編寫，竟有一段並不比他本人生命更短的、充滿了曲折起伏的故事；而且，

〔一〕 梁啟超：《中國歷史研究法·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》，第二六〇頁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二〇一四年。

〔二〕 劉東：《「文勝質則史」的真義：歷史與現實中的佞史傳統》，《中國學術》，第二十八輯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二〇一一年。

〔三〕 《論語·憲問》。

讀到後邊大家還會想到，這個故事還遠沒有結束。——幸而，我們在中華書局的合作者俞國林，已經根據不少唯在書局內部才能讀到的文獻，特別是很多不為人知的信札，大致釐清了這段歷史的前半部；而我在本節中的不少描述，也要仰仗他所提供的細節材料。

還要從一九二九年任公逝世時說起。在一片悲痛的心情中，梁家的親屬故舊曾經議定了兩件大事：其一，是基於一九一六年版的《飲冰室全集》，和一九二六年版的《飲冰室文集》，編出更完整的梁啟超著作集，這件事交由林志鈞負責；其二，則是開始準備梁啟超年譜的編修，來為將來的梁啟超傳記鋪墊材料，這件事交由丁文江負責。到了一九三六年，隨着《飲冰室合集》的面世，林志鈞負責的工作已告完成，足見當初之所托尚稱得人。而相比之下，身為地質學家的丁文江，則由於總是無法全力投入，遂不得不通過顧頡剛等人的推薦，於一九三二年從燕大聘來剛畢業的趙豐田，協助自己來推進年譜的工作。

這麼着，我們便可從趙豐田的回憶中，獲悉丁文江對於年譜的設計，從而方便了對其中得失再進行檢討：「……丁文江對此已有了比較成熟的意見，向我強調了下面幾個主要之點：一、梁啟超生前很欣賞西人「畫我象我」的名言，年譜要全面地、真實地反映譜主的面貌；二、本譜要有自己的特點，即以梁的來往信札為主，其他一般資料少用；三、採用梁在《中國歷史研究補編》中講的編輯方法，平述和綱目並用的編年體；四、用語體文先編部年譜長編。這最後一點與梁家的意見不同。梁的家屬主張編年譜，並用文言文。丁文江覺得重要材料很多，先編年譜長編，既可以保存較多的材料，又可較快成書。他又是胡適的好友，很贊成胡適提倡的白話文運動，所以仍是堅持用白話文。」〔二〕

到了一九三四年秋，主要是近萬件往返信札的基礎上，也涵括了一些其他的材料，丁、趙二人共同編出了其第一稿，總共抄成了厚厚的二十二冊，計約一百萬字有餘，這便是任公年譜最初的初稿，可稱為《梁啟超年譜長編·原抄本》，而相對於後出的篇幅較短的「長編」，它也被人們稱為「長編之長編」。至於分別對這部「原抄本」的具體貢獻，以及此後對它的改寫方案，則可從丁文江一九三五年寫給舒新城的信中略窺：

〔二〕《梁啟超年譜長編·前言》，丁文江、趙豐田（編）：《梁啟超年譜長編》，第二頁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二〇〇九年。

新城先生足下：

在申晤談，承允爲《任公年譜》設法出版，至爲感慰。茲就前日所談各點，擬具辦法如下：一、《年譜長編》系趙君豐田擬稿，計共爲五十萬字（原文如此——引者），字數過多，應詳加刪節，方可出版；茲擬假定年譜字數爲二十萬（最多二十五萬），於最近期中請趙君來京，與弟會同，着手刪節。二、預計刪節工作，應可本年內完成。三、擬請中華書局預付版稅洋八百元（六月初付一半，九月初再付一半），爲鈔寫費用及趙君數月薪水。四、出版時期，一聽中華酌定。以上各節統祈查照，賜覆爲荷。此頌
大安！

弟丁文江頓首 號在君

五月二十一日（二）

屈指算來，從丁文江自南京發出這封信，到他於次年初煤氣中毒死於長沙，也只有短短的半年時間了。在此之後，則由其友翁文灝接管此事，而趙豐田也已感到不可戀戰，故只到了一九三六年的五月，便草草地完成了其第二稿，篇幅約有六十七萬字。它被題名爲《梁啓超先生年譜長編初稿》，總共只油印了五十部，而每部又被裝訂爲十二冊，用以在小範圍內徵求意見。在這裏爲了區分的方便，又可把它稱爲《梁啓超年譜長編·油印本》。

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五日，陳叔通曾就此修書給梁令嫻和梁思成，從中不僅可以看出上述油印本的草率處，也能由此理解這個版本何以未能面世——「《年譜》底本，確不滿意。趙君未克負在君委屬之意，後尤草率。花錢不少，可以請一位比趙君高明得多的人亦不難。弟閱第一本，當以爲大致不差，愈看愈不對，始主張宰平總閱。實知張君亦不足以了此事也。弟盼速成，但亦不願草率。」可無論如何，根據趙豐田在一九六三年的回憶，又可知編寫的努力仍在繼續。而爲了幫讀者瞭解發展至此的脈絡，這裏應把它原本引證出來：

〔一〕 俞國林：《梁任公著作在中華書局出版始末》，《飲冰室合集》（典藏版）附冊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二〇一五年。

(一) 信札原件(約六千通)，絕大部分為副本，餘信手稿(電稿僅此)，這批資料不在臺灣；發表過的文字，主要根據乙丑重編本《文集》(當時《合集》未出版)；筆記之類的材料，亦皆傳抄副本；他人發表過的文章和有關事實的陳述，則分別根據其原書原文而成。以上為第一批原料，該項原料本身(主要指抄副本)已存在着一些錯漏字句。

(二) 根據上述各項資料編成了一套資料彙編(或稱長編之長編)，裝定為二十二冊，基本上全部按年排列，中加簡單說明聯繫的文句。這份資料共三部，第一部係墨筆鈔本(現在北京，謄寫員所鈔)，餘二部則據第一部用曬蘭紙印成者，可能臺灣有一部，但估計「臺本」並未據此本校訂。這套資料約多於《長編》百分(之)三十上下。在謄寫員鈔錄過程中，又出現一部分錯漏字句，似較上述副本中的還多些。

(三) 根據上述資料又編了一部《年譜長編》，分量約達前者十分之七。這部長編稿本是用墨筆鈔成的(可稱為《梁啟超年譜長編·墨筆本》——引者)，在這次編鈔過程中，改正了一部(分)錯字，可能又產生了一些錯字。這部稿本可能在臺灣。

(四) 現在流行的油印十二本的《年譜長編》(初稿)，是根據上述稿本用蠟紙刻印的，在刻印過程中，又產生許多錯漏字，其數量可能較前三次更多。(一)

如果說，儘管出現了人事的突兀變故，可年譜的編寫至此仍然屬於正常，那麼，此後則因為種種的戰亂與動盪，竟使種種不同的前述稿本，分別獲得了不同的命運。——更令人嗟呀的是，如果當年甫從燕大畢業的趙豐田，還只是因為師長們信手推薦，而無偶然地參加了年譜編寫，那麼，這件工作竟被一再地遷延，並最終演成了他畢生的沉重背負。

在此要插進來交代的是，到了一九六二年的十二月十七日，梁家長子梁思成曾托人將前邊提到的「年譜長編」的原稿，送到了位於翠微路的中華書局《梁集》編輯室，並附帶寫來了一封便簡：

王代文同志：

茲將「年譜長編」原稿送上，請查收。建議將其中有些關於家庭瑣事的信札鈔錄刪去。乞封達豐田先生。即頌

〔二〕 俞國林：《梁任公著作在中華書局出版始末》，《飲冰室合集》(典藏版)附冊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二〇一五年。

撰祺！

梁思成

六二年十二月廿七日〔一〕

這正是我們在五十多年以後，想要原樣影印出來的稿本！它們是整整齊齊的二十二冊，統一謄抄在印有「梁啟超先生年譜稿紙」字樣，如今已經發黃變脆的紙面上，——而我們借由前文中的說明，可知這正是那部所謂「長編之長編」，或曰《梁啟超年譜長編·原抄本》！再從信中所謂「乞封達豐田先生」的字樣，還可知若按梁思成本人的初衷，仍是要幫助趙豐田去完成年譜。可不管是由於什麼原因，總歸這部稿子是自此之後，便已安躺在中華書局的保險櫃裏，既很遺憾地未能被趙豐田利用上〔二〕，却也很僥倖地躲過了文革。

既然這樣，讀者們也就可以推知，遲至一九八三年才得以面世的，標明了是由丁文江、趙豐田合編的《梁啟超年譜長編》，就只能基於此後生成的其他稿本了。而按照前引的趙豐田之回憶，可知它們分別就是《梁啟超年譜長編·墨筆本》，和《梁啟超年譜長編·油印本》，而兩者間雖可能存在些許筆誤的差別，但畢竟後者是基於前者而刻成的，所以大體上還是屬於同一種東西。於是不待言，既然《梁啟超年譜長編·墨筆本》據說「可能在臺灣」，那麼趙豐田接下來的工作，就只能再基於《梁啟超年譜長編·油印本》了。更進一步，在我們這條敘述的主線之外，還應當交代兩個較小的插曲。其一是，後來海峽對岸爲了紀念丁文江（而不是梁啟超），曾從史語所裏借出了年譜油印本，仍以《梁啟超先生年譜長編初稿》爲題，在一九五八年由世界書局重抄出版，而丁文江的生前友好胡適，以及丁文江的四弟丁文淵，還分別爲這個本子撰寫過《序》或《前言》。並且，該書後來也輾轉流入了大陸，或許

〔一〕 俞國林：《梁任公著作在中華書局出版始末》，《飲冰室合集》（典藏版）附冊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二〇一五年。

〔二〕 甚至，根據書局編輯向當事人的瞭解，還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情：「『文革』結束後，趙豐田派助手來京，商談《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》重新整理事宜，欲撤開原整理本，獨立承擔，重新整理，並希望中華提供『長編之長編』、『油印本』等，李凱未允。」（俞國林：《梁任公著作在中華書局出版始末》）。

還曾對中華書局有過促動。不過，由於它只是在重抄的過程中，修正了若干明顯的錯字，却又無端錯排了若干字，還刪改了一些不利於國民黨的內容，若從版本學的角度似可忽略。

其二是，接下來在中華書局的促請下，大約是從一九六二年開始，復旦大學的陳匡時即着手校勘，以便重印大陸版的年譜油印本。這項工作經過了兩年多的努力，至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六日宣告完成，並當即全數寄到了中華書局。所以，細心的讀者還不可不察，這個《梁啟超先生年譜長編初稿》，或曰《梁啟超年譜長編·油印本》，又有個出自陳匡時之手的「陳氏校勘本」，它至今還躺在中華書局的書櫃裏，而當時只是出於下述的考慮，才未能被書局順利印行出來：

(一)《年譜長編》中引用梁氏信札很多，這些信札，我們現在已搜求到，而陳匡時同志則是無法見到的，因而這部分的核對工作須補做。

(二)現在梁集小組搜求的梁氏信札，也有一部分是趙豐田先生編《年譜長編》時沒有見到。如果我們出版這部書，以把這一部分資料補充進去為宜。(臺灣本僅改正了油印本的若干顯著錯字，同時也錯排了若干字。且有刪改，尤其是不利於國民黨的言論。我們補充以引所見的資料可大大超過臺灣本。)

(三)趙豐田先生有自行整理這部《年譜長編》的意思，此書如果出版，似以請趙豐田先生親自或由他委託他的助手來最後完成為宜。(一)

無論如何，趙豐田至此已屬於眾望所歸了，而他終究也算是不負眾望，趕在生命結束前獻出了《梁啟超年譜長編》，使大家得以在久違之後，再次親切地瞭解到任公跌宕起伏、綫條交織的生平。只是，如從趙豐田於一九三二年受命編寫它算起，到它最終於一九八三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，竟整整遷延了半世紀的時間，而作者至此也已從翩翩一少年(二十七歲)，被拖延成了垂垂一老者(七十四歲)，豈能不令人為之浩歎？不過即使如此，一方面，讀者們自應感佩他杜鵑啼血的精神，而另一方面，這位作者到了自己生命的官子階段，也同樣要感激命運對他的眷顧。畢竟，儘管少數專家還可以記住，趙豐田又曾出版過《晚清五十年經濟思想史》

〔一〕俞國林：《梁任公著作在中華書局出版始末》，《飲冰室合集》（典藏版）附冊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二〇一五年。

的論著（哈佛燕京學社，一九三九年版），但廣大讀者之所以會熟悉他的名字，則主要還是因為這部梁啟超年譜。由此也就不妨說，這位作者竟是幾乎畢其一生，都跟任公的名字連在了一起，而梁啟超生平本身的意義，也就賦予了趙豐田以相應的意義。

三

正如本文之初所述，此後圍繞這部年譜的故事則是，到了二〇一〇年的五月，中華書局又曾跟本院合作，推出了《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（初稿）》，而爲了區別起見，這個本子又可被稱作「年譜新編」。它是由歐陽哲生另據一部「油印本」整理而成，並和卞僧慧的《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初稿》一起，被收入了「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年譜長編」的系列。所以，如果更仔細地點算，年譜的稿本更有下述的發展和分散過程：

- （甲）長編之素材（原件，已佚）
- （乙）長編之長編（原抄本，現存中華書局）
- （丙）長編墨筆本（據說可能存於臺灣）
- （丁）長編油印本（又稱「初稿」，分藏於各地）
- （戊）陳氏校勘本（未刊，現存於中華書局）
- （己）年譜長編（上海人民版）
- （庚）年譜新編（中華書局版）

此間的複雜性表現爲，儘管就一般的規律來講，年譜這種層層疊加的文體，總可能是後來居上、晚出轉精的，可眼下情況却比較特殊，使得我們在埋頭忙碌了許久之後，終究還是要再回過頭來，面對這樣一部珍貴的孤本、即作爲原抄本的「長編之長編」！職是之故，自從在五年前偶然聽說，這個原抄本居然有可能還存在，只是無端遺失了保險櫃的鑰匙，我就不斷在跟俞國林商量，希

望能儘快地找到它，並想個法子把它公之於衆；因爲根據以往的經驗教訓，但凡碰到這種紙質脆弱的孤本，只有儘快把它印刷出來，才能保住其中的珍貴內容！

我這種按捺不住的心情，當然還是如前文中所述，來自我對於傳主本人的、通過閱讀而建立的同情。最近幾年間，我已經多次就任公發過筆，所以這種同情也不必再贅言。無可辯駁的是，儘管早在將近一個世紀前，這位本院早期的導師就已被說成「過時」了，然而此後，不管是在國際還是在國內，他都仍然在佔據着議論的中心。由此，在這部所謂「長編之長編」中，很多當年看來不重要的細節，如今却未必就不值得發表，而很多當年需要刪改的地方，如今反而有可能更值得保留。即使梁思成在那個「山雨欲來」的年代，曾明確地「建議將其中有些關於家庭瑣事的信札鈔錄刪去」，但以我對於任公生平的關切，那些家常話於今讀來也很有味道，它會讓當年梁家的很多生活細節，都顯得更加歷歷在目、清晰可辨，也讓《梁啓超和他的兒女們》之類的書籍，有了更豐富可靠的增補素材。更不消說，正因爲那些發自任公的、哪怕是比較簡短的信函，在此後都早已佚失了或毀棄了，這個抄本就更顯出了它的價值，甚至顯得是彌足珍貴。

當然，我在此無意去指責前邊的工作，說人們當年實在是不識貨。事實上，我自己的判斷也只有在今天，才能够自然而然、毫不費難地得出。這是因爲，一旦隨着歷史語境的遷移，傳主在過往歷史中的地位，也開始出現了相應的變化，那麼，圍繞他本人所修撰的年譜，無論是其內容還是其篇幅，也都會跟着發生相應的變化。在這個意義上，我們自然能够會心地理解，這部命運多變的梁啓超年譜，從他謝世起就開始動議，到總算是找到人協助修撰，到只是爲了紀念丁文江才草草付印，到在文革前又打消了復旦校注本，到在開放時代則公開印行了定本，到中華書局又對之重新校訂，到我們現在還要再付出努力，打算公開推出這部「長編之長編」，——這一切說白了，都無非是梁啓超本人不斷沉浮的歷史地位之縮影！

而不管怎麼說，只要是有這部「長編之長編」，畢竟就能拿來對照上海人民版的年譜，驗證一下趙豐田的工作品質，看看有沒有被他抄錯的字句，看看他都保存、增補或刪掉了哪些內容，而這些處理是否都在合理的範圍？——從正面來講，如果他的保存、刪節或增補，看起來都是理由充足，我們便可從中體會到他的文心，感受到一番印證妙合之樂；從反面來說，如果他的某些刪節不見得合理，我們就更更要着重地記載下來，也許就找到了以前未曾被注意到、以後仍然用得着的史料。

說到這裏，想起曾從俞國林整理的文件中，見到過一些耐人尋味的段落，它們雖然不是趙豐田寫下的，却有助於理解他那部年譜的好處：「刪節與否？年譜□□□天有參考價值的內容不少，但所關係張的內容也有許多，要不要刪節，是會提出來的。從主要是供研究工作參考和使用來看，我們認為還是保留年譜本來面目為宜，僅作一些技術上的改動。另外，刪節的要求與界限也極難劃分與掌握，弊病較多。」^{〔一〕}「如果考慮刪節，則年譜使用價值就會降低，研究工作者也不得不重新利用年譜油印本，進而使重印的目的也會部分的達不到，形成研究者又要交叉地使用重印本與油印本的困難。」^{〔二〕}我想，凡是細讀一九八三年版梁啟超年譜的人，讀到這裏都將會心地微笑了——這正是趙豐田工作的價值所在，並且也正因為這一點，使得他最終拿出來的這部年譜，肯定無愧於此中的典範之作，既充滿了一定的勇敢與解放，也充滿了相當的機敏與智慧。

不過，我們在前邊的敘述中，也曾預留了一些存疑的伏筆，現在又要把它們再啟動出來。大家肯定都還記得，丁文江為這部書特製的規則是：「本譜要有自己的特點，即以梁的來往信札為主，其他一般資料少用」。不管這樣的規則是否合理，它都不是作為晚輩的趙豐田能够質疑的。所以，儘管他也從原抄本中刪節了一些家常書信，但他在油印本的基礎上所增補的內容，也同樣是一些後來發現的書信。正因為這樣，看來正是受到了丁文江的約束，我們現在所能讀到的這部以趙豐田為第二作者的《長編》，如果驗之以對於年譜本身的文體要求，其在書信和著述之間的比例，還是顯得大大偏重或失衡了。

那麼，到底為什麼要只收書信呢？一般的解釋是，這是出於《年譜》與《合集》的最初分工。但更有意思的是，即使對像年譜這般中國化的文本形式，那篇根據丁文江的意見所擬定的《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例言》，還在其第二條上赫然援引了國外的權威：「本書採用英人《赫胥黎傳記》（*The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Henry Huxley*）體例，故內容方面多采原料，就中尤以信件材料為主。」^{〔三〕}這就不能不令人警覺地意識到，儘管丁文江跟任公很有私交，甚至為後者寫下了這樣的挽詞：「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鮑子；在地為河嶽，在天為日星」，但兩人在文化觀念上畢竟南轅北轍，正因為這樣，也才會出現趙豐田回憶到的情況：「梁的家屬

〔一〕 俞國林：《梁任公著作在中華書局出版始末》，《飲冰室合集》（典藏版）附冊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二〇一五年。

〔二〕 俞國林：《梁任公著作在中華書局出版始末》，《飲冰室合集》（典藏版）附冊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二〇一五年。

〔三〕 《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例言》，丁文江、趙豐田（編），《梁啟超年譜長編》，第一頁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二〇〇九年。